

元末山西的军事争夺

瞿大风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文摘: 元朝末年, 全国形势动荡不已, 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大江南北陆续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元朝上层统治集团之间发生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相互争夺。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 山西地区被卷入到元廷及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纷争冲突之中, 且对腹里地区, 乃至全国上下的军事、政治与经济产生较为重大影响。本文拟从红巾军、地方军阀、元廷内部与明军北伐在河东山西的军事争夺等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元代; 山西; 军事斗争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一、红巾军的夹击进攻

元末之中, 北方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建立宋政权以后, 以韩林儿、刘福通为首的北方红巾军为了更为有力地打击元朝统治集团, 发动了攻势强大的北伐战争。在这次北伐战争中, 山西地区成为红巾军实现夹击大都战略目标的重要战区。然而, 由于河东山西地方军阀的势力强大, 不仅充分利用了山西地区的险要地形, 而且还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 致使红巾军不断遭到严重打击, 最后以受挫失利告终。

红巾军在山西地区最初遇到的地方军阀就是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 字廷瑞, 系出北庭。父祖居家河南, 为颍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儿“尝应进士举, 有时名”, “常慨然有当世之志”。^[1]至正十一年(1351), 红巾军在汝、颍举事以后, 元廷“征兵致讨, 卒无成功”。^[1]至正十二年(1352), 察罕帖木儿率众起兵, 沈丘之子弟从者数百, 遂与李思齐合兵, 同设奇计袭破罗山红巾军。为此, 元廷授以察罕帖木儿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 始得万人, 自成一军, 屯驻沈丘。至正十五年(1355), 红巾军不断发展壮大, 攻陷邓、许、嵩、洛等地。于是, 察罕帖木儿率军征讨, 转战河南, 军声大振。至正十六年(1356), 察罕帖木儿升迁中书兵部尚书。

在红巾军西攻陕州, 断穀、函, 趋秦、晋之际, 河南知枢密院事答失八都鲁始调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前往镇压。察罕帖木儿鼓而西行, 设置疑兵, 拔下灵宝, 形成防线, 遂使红巾军的行动受阻。其后, 红巾军渡河“陷平陆, 掠安邑, 蹂晋南鄙”, 随即遭到察罕帖木儿追杀袭剿, “蹙之以铁骑”, “死者甚众”。^[1]察罕帖木儿在山西地区相持数月之后, 旗开得胜, 首挫红巾军, 升迁加授中奉大夫、佷河北行枢密院事。

至正十七年(1357)六月, 刘福通率红巾军进攻汴梁, 同时分军三道进行北伐, 其中, 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的中路红巾军进攻晋、冀,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的西路红巾军往趋关中, 毛贵的东路红巾军兵出山东, 北进大都。在这次重大军事行动中, 东路红巾军经由山东进攻大都, 中路红巾军进攻山西地区, 转入河北, 进而东、西两路大军夹击大都。九月, 中路红巾军越过太行山, 攻下泽州陵川县城, 县尹死殁。中路红巾军攻势凌厉, 乃使山西地区的“宗戚二王, 力莫能遏”。^[2]元廷派出佷枢马乞剌前往守御, 力不能支。闰九月, 中路红巾军进占潞州, 进攻冀宁。十一月, 再侵壶关。

就中路红巾军攻入山西地区展开军势，将与山东地区的东路红巾军会师，进而夹攻大都的紧要关头，潞州人李惟馨对热衷于在陕西兴元展开行动的察罕帖木儿提出剪除中路红巾军，迅速夺取山西地区，控制中原，辅翼大都的战略对策。

李惟馨，字庭芳，“质敏好学，有经济才”。[3]至正年间，江淮兵起，丞相脱脱延入幕府，用其策略平定过徐州之乱。至正十年（1350），李惟馨返家为父服丧。当时，曹、濮红巾军越过太行山，攻陷陵川、高平，乡中之民惶惶奔窜。对此，李惟馨不仅设法加以劝阻，而且“率众凭险以守”[3]，捕捉俘获不少红巾军。察罕帖木儿在关中闻知其名，招聘幕下参与军务。

对于山西地区的军事地位及其作用，李惟馨认为，“三晋河山之固甲天下，民勤物阜，形势都会，必欲削寇乱，安王室，收不世之功，非河东无以为资。且东寇垂涎日久，志在必得，一失上党，是无河东，大事去矣。若选精骑昼夜疾驰，出其不意，破之必矣。是将军舍区区偏隅而全中原之上游，苟利社稷，专之尚可，况奉命便宜乎！”[3]因而提出“东取冀、晋，固守上党，羽翼京师”[4]的战略对策。鉴于李惟馨的清醒认识，察罕帖木儿派出总兵关保与虎林赤前往潞州攻击红巾军，着手控制晋南地区的危机形势。

李惟馨除了倾心竭力、出谋划策以外，还亲自参与作战行动，施展手段分化瓦解红巾军的武装力量。其间，潞州李氏聚众万人与红巾军暗中联手，官军一度围攻不下。于是，李惟馨亲自前往游说李氏，诱以官职、功名与荣华富贵，遂使其众降附瓦解。其间，元军出于缺粮乏食，丝毫不管百姓死活，“欲尽括民粟”。对此，李惟馨则极力制止，避免激起民变暴动，同时劝说富裕之家出粮纳粟，以供军食。[4]在这次守御潞州的战役之中，李惟馨为元统治者镇压红巾军，维护元朝统治的长治久安立下了“不世之功”。

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毛贵率领东路红巾军进入河北，逼近大都。为了实施夹攻大都的战略计划，加强中路军的力量，毛贵派遣部将王士诚率领山东曹州红巾军向北进击，“分道逾太行，焚上党，掠晋、冀，陷云中、雁门、代郡，烽火数千里”。[1]三月，王士诚陷晋宁路，总管杜赛因不花死殁。为此，察罕帖木儿“出关渡蒲坂，勒兵解之闻喜”[5]，派遣赛因赤等收复晋宁路。

不久，中路红巾军又分两路进犯晋、冀，一出沁州，一侵絳州。五月，察罕帖木儿派遣董克昌等兵复冀宁以后，元廷诏命察罕帖木儿镇守冀宁。在红巾军从河北进入潞州，继攻襄垣之时，关保分军击败逾越太行山的红巾军，且自黎城下吾儿峪，命其弟赛固（因）不花勒兵横击，获得大捷。随后，元廷诏命关保守御潞州，加强对潞州的防御。当时，红巾军一至壶关，关保派兵即往与战，又与红巾军血战高平，大败其军，继而“南据高平、泽郡”。是月，元廷升迁察罕帖木儿担任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升迁关保为河东宣慰使，复遣招讨万户虎林赤作为辅佐。

六月，关先生、破头潘的中路红巾军拔辽州，据榆社。察罕帖木儿部将关保与虎林赤“抵城破杀”[2]，乘胜追击，迫使关先生转攻冀宁路。随后，察罕帖木儿调遣虎林赤与关保同守潞州。继而，元廷封授察罕帖木儿担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便宜行事。七月，察罕帖木儿驻军洛阳，派遣伯帖木儿以兵守御碗子城。

是秋，红巾军首领刘子才，掠林虑、天平、冰山等二十余寨，拥众再攻泽、潞。关保率领铁骑数千往来守御，迎战越山而来的红巾军。关保击溃前军之后，复经羊嵬山，合众二十余万，分其所部作为奇兵，自将大兵大破红巾军。九月，红巾军又据松子岭及店城东山，其势大张。虎林赤分领董仲义与上党县尹郭从善所率义兵形成犄角之势。其后，关保统领仲义等部大破红巾军，乃使红巾军“僵尸百里，蹂躏殆尽”[2]，被迫北进晋宁、大同，从而彻底稳定了泽、潞地区的整个战局。随后，察罕帖木儿调派关保与虎林赤收复晋宁地区。

察罕帖木儿与李惟馨在对付红巾军的军事行动中，以“太行多厄，若分兵阻遏，盗必不入，功收万全”，积极采取“列守诸口，咸获其利”的战略战术，“分兵屯泽州，塞碗子城，屯上党，塞吾儿谷，屯并州，塞井陘口”[2]，因地险易，屏塞杜绝太行诸道。其间，察罕帖木儿还遣兵伏于南山关隘，自勒重兵屯驻闻喜、絳阳。红巾军一走南山，便被伏兵横击，而不得不丢弃輜重走山越谷，“得南还者为

数无几”。[1]这一战略战术有效地破坏了红巾军攻取山西地区的战略行动，切断了红巾军的南北联系，最终不仅平定了山西地区，而且还削弱了红巾军扩大军势与夹攻大都的武装力量。由此，元廷进封察罕帖木儿担任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且受天子之诏守御关陕、晋、冀，抚镇汉、沔、荆、襄，便宜行阃外事。[1]

随后，察罕帖木儿继续派军在晋北地区追剿中路红巾军。至正十八年（1359）九月，关先生的中路军攻保定路，拟经河东山西进入河北，与毛贵的东路军会师集结。结果，由于井陘口已被重兵阻塞，难以通过。当时，尽管一支红巾军已经攻下平定州，接近井陘口，但却最终未能将其攻破，乃使整个战略计划遭到破坏。于是，中路军主力转攻大同。冬十月，红巾军占领大同诸县，达鲁花赤完者帖木儿弃城逃走。于是，察罕帖木儿派遣关保与虎林赤追剿中路红巾军，率部进入大同地区，直至将中路红巾军逐出山西地区。

北方红巾军在转战晋北地区之时，还遇到过另一地方军阀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曾祖纽璘，答失八都鲁之子。答失八都鲁初以世袭万户镇守罗罗宣慰司，后任大理宣慰司都元帅、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枢密院事，总领荆襄诸军。至正十五年（1355），元廷诏命答失八都鲁管领太不花一应诸王籓将兵马，许以便宜行事。六月，答失八都鲁转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受命勤王进入河南与红巾军作战。至正十六年（1356），孛罗帖木儿升任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行枢密院事，守御汴梁，兼任四川行省左丞。至正十七年（1359），元廷诏朝京师，加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

孛罗帖木儿一直从父征讨红巾军，屡立战功。答失八都鲁死殁以后，孛罗帖木儿引兵退驻井陘口。至正十八年（1359）正月，元廷诏命孛罗帖木儿仍旧总领其父原管诸军。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元廷又诏孛罗帖木儿移兵镇守大同[6]，以为京师捍蔽屏藩。

至正二十年（1360）春三月，红巾军攻冀宁路，攻下太原。[7]《明史·韩林儿传》提到，王士诚于是年“又躏晋、冀”指的便是此事。[8]七月，孛罗帖木儿在台州击败王士诚。此后，红巾军虽然继续在晋北地区开展军事活动，但是，红巾军在山西地区不断受到挫折，大势已去，无法继续在河东山西形成更为有利的局面。随着孛罗帖木儿在晋北地区取得打击红巾军的节节胜利，一些红巾军首领开始变节，缴械投降孛罗帖木儿。至正二十二年（1362）二月，红巾军将领左李派遣杨荣祖至大同归降。至此，中路红巾军在山西地区的军事行动以无法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宣告失败。

在镇压中路红巾军的过程之中，孛罗帖木儿的个人地位与军事势力得到很大加强。至正二十年（1360）七月，元廷诏命孛罗帖木儿总领所有蒙古、汉人诸军，便宜行事。至正二十二年（1362）三月，孛罗帖木儿派遣裨将也速不花等招兵五万，戍守大同。随后，元廷诏升孛罗帖木儿太尉、中书平章，位居第一，并且取得节制张良弼的权力。[9]

二、察氏与孛氏两大军阀的反复争夺

元末之中，山西地区逐步形成两大地方军阀集团，一是以察罕帖木儿为首的军阀集团，一是以孛罗帖木儿为首的军阀集团。这两大地方军阀集团是在红巾军分成三路北伐期间勤王进入河东山西的。随着红巾军在山西地区的作战失利，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个人野心逐渐膨胀，始将山西地区变成相互争夺的主要地区与重要战场。

由于晋、冀大部地区是察罕帖木儿出力平定的，因此，他在山西地区的势力范围逐渐从晋南地区扩大到晋中地区。作为勤王入卫的军事将领，察罕帖木儿在进入山西地区之初并无任命行政官员的任何权力，然而，随着形势变化与扩张实力的需要，察罕帖木儿不仅将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晋南地区扩展到晋中地区，而且开始自行其事地派出所属官员控制、主持晋中地区的行政事务。至正十八（1358）年三月，红巾军攻陷冀宁，中书分省冀宁长官平章臧卜遁逃而去。五月，察罕帖木儿派遣董克昌等以兵收复冀宁之后，便“自以刘尚质为冀宁路总管”，又“遣琐住院判来冀宁镇守”。[10]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中书右丞相太不花被元廷诛杀以后，所部军队崩溃瓦解，数万散兵游勇大肆抄掠山西地区。借此，察罕帖木儿派出陈秉直“分兵驻扎榆次予以招抚”，进行收编，扩大势力，还将军中首领全部送往河南

屯田。是年五月，察罕帖木儿既定河南以后，仍以“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1]，开始长期驻扎到河东山西。

孛罗帖木儿则是在答失八都鲁死后，于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受诏奉命“移兵镇大同，以为京师捍蔽”^[1]的。面对察罕帖木儿军事势力的不断扩张，孛罗帖木儿毫不示弱，甚至妄图吞并晋、冀来扩大自己的军事势力。于是，双方依靠各自的军事力量在山西地区展开激烈的相互争夺。

对于两大军阀的争斗交恶，元廷一面不失时机地将朝中重臣派到山西地区，一面屡屡下诏调解矛盾，一面又有意无意地在两者之间时而引发事端，时而制造平衡。至正二十年（1360）正月，元廷以右丞不花、参政王时分省冀宁。六月，诏命孛罗帖木儿部将方脱脱“守御岚、兴、保德州等处”，又诏“今后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部将，毋得互相越境，侵犯所守信地，因而仇杀，方脱脱不得出岚、兴州境界，察罕帖木儿亦不得侵入其地”。秋七月，诏孛罗帖木儿“总领达达、汉儿军马，为总兵官，仍便宜行事”。^[11]八月，元廷鉴于“察罕与孛罗常构兵争晋冀之地”，“以晋冀分属两家”^[6]，诏命孛罗帖木儿戍守石岭关以北地区^[12]，察罕帖木儿戍守石岭关以南地区，进一步为双方划出势力范围。九月，元廷又遣参政政事也先不花往谕孛罗帖木儿与察罕帖木儿，令其讲和。其间，孛罗帖木儿在权力扩大后，欲得冀宁，调军自石岭关兵临太原，围城三日，试图进占，后因察罕帖木儿调遣参政阎奉先引军出战，才不得不退回交城屯兵。随后，双方便以石岭关为界各守其地。^[11]

值得深究的是，至正二十年（1360）十月，元廷在双方停战的自守状态下，一方面向察罕帖木儿发出将太原交给孛罗帖木儿的诏命，另一方面向孛罗帖木儿发出戍守太原的诏命。为此，孛罗帖木儿派出保保、殷兴祖、高脱因倍道直趋冀宁，然而，察罕帖木儿的太原戍兵拒命不纳。随后，察罕帖木儿派遣陈秉直、白琐住等，率兵前来争夺冀宁，击败孛罗帖木儿所部的脱列伯军。^[1]于是，两大军阀的交恶争斗风云再起，孛罗帖木儿以执行元廷诏命作为己任，将其势力向晋中地区不断扩张。十一月，孛罗帖木儿以兵侵入汾州，察罕帖木儿则以兵对抗。

至正二十一年（1361）春正月，元廷以孛罗帖木儿纵兵抄掠冀宁等地，又命中书参政政事七十往谕孛罗帖木儿罢兵还镇。与此同时，派遣使臣往谕察罕帖木儿，令其罢兵。对于元廷率意为之，反复无常的诏命，察罕帖木儿深怀不满，置之不顾，继续进攻孛罗帖木儿。二月，察罕帖木儿驻兵霍州，攻击孛罗帖木儿。五月，察罕帖木儿以兵侵入到孛罗帖木儿的所守之地，致使孛罗帖木儿处于被动防御之势。

至正二十二年（1362）六月，察罕帖木儿遇刺身亡。经由所部推举其养子扩廓帖木儿出任总兵官后，元廷授予扩廓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东等处行枢密院事、同知詹事院事，承袭率领察罕帖木儿的官衔职位及其原班人马，且使“一应军马，并听节制”，成为察氏军阀集团新的代表人物。孛罗帖木儿则乘着察罕帖木儿死去，向山西地区两侧的河北与陕西地区大肆展开军事行动，同时还对晋南地区进行包抄。八月，孛罗帖木儿、张良弼“据延安，掠黄河上下，欲东渡以夺晋宁”。^[13]冬十月，孛罗帖木儿向南侵入扩廓帖木儿的所守之地，并且进据真定路。

至正二十三年（1363）三月，元廷诏命中书平章政事爱不花分省冀宁，重新正式向山西地区派出行政官员之时，扩廓帖木儿依旧派军驻在太原地区，牢牢把持着太原地区的军政权力不肯放弃，致使“冀宁分省遂罢”。^[10]冬十月，孛罗帖木儿再次用兵进攻冀宁。结果，扩廓帖木儿将其大败，生擒其部乌马儿、殷兴祖等将领。在扩廓帖木儿的军事优势下，元廷经过屡次命官讲和，方使两军还兵休战。其后，扩廓帖木儿兵驻太原，重新与驻扎大同的孛罗帖木儿各守其地，以势相持。

在军阀集团激烈争夺河东山西的过程之中，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与元廷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各有所图，相互牵制，且又非常微妙。当初，察罕帖木儿“自以刘尚质为冀宁路总管”的擅权举措，已经暴露不臣之心。至正二十三年（1363），扩廓帖木儿以朱文明为泽州知州。^[14]这个朱文明显然亦非元廷所任。察罕帖木儿的擅权行为是元廷统治逐渐削弱，各地军阀专恣日甚的显著标志之一。由此，各地军阀纷纷得以便宜任官，“承制拟授，具姓名以军功奏闻”，元廷则“宣命敕牒随所索而给”，遂使“名爵日滥，纪纲日紊”。^[10]

为此，孛罗帖木儿极力扬言扩廓帖木儿“踵袭父恶，有不臣之罪”。[13]然而，至正二十年（1360），孛罗帖木儿同样步其后尘，自命其官。他所选任的坚州达鲁花赤兼防御巡绰事完者帖木儿亦非朝命官员，因为元代官制中根本就没有“防御巡绰事”这种官衔。[15]在这种统治混乱的状况之下，山西地区不少州县中的达鲁花赤、知州、县尹等长贰官员均设二人，形成一为元廷朝命，一为各地总兵官私设自置的局面。《山右石刻丛编》中的《忽都帖木儿祷雨获应记》碑末列衔的泽州达鲁花赤便有三员。[16]另一碑文《祷雨获应记》中列出的泽州达鲁花赤居然多达三员，各有同知、判官两员。[17]

就察罕帖木儿一手独霸河东山西来说，元顺帝似乎并不情愿，且有担心察罕帖木儿尾大不掉，震慑大都之嫌。如前所述，他在别有用心地诏命察罕帖木儿将冀宁交给孛罗帖木儿之时，便不无将山西地区分而治之的政治意图。对于山西地区，察罕帖木儿深知“用兵数年，惟藉冀、晋以给军而致盛强”，惟恐“奉旨与之，则彼得以足其兵食”。[11]因而借口用兵汴梁，屯兵泽、潞，增强军力加以抗拒。当时，察罕帖木儿兵强马壮，军力雄厚，即使元顺帝想要采取强硬措施，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在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元军丧失作战能力的不利状况下，元顺帝除了担心“构兵不已，以致盗贼愈炽”以外，还想利用这些地方军阀势力镇压北方红巾军，维护元末政权的残余统治。经过反复权衡，元顺帝只能一面设法调节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保存实力，一面封官加爵，“分任乃职”。[18]促使两者将主要矛头对准北方红巾军，以期“同济时艰”。[19]然而，一旦元廷内部出现新的权力争夺，这种政治局面很快便发生了新的变化。

三、帝党与太子党的激烈争权

元末之中，除了地方军阀在外争夺，元廷内部逐渐形成支持元顺帝的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一党与支持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奇皇后、丞相搠思监、宦者朴不花一党。为了便于展开论述，拟将前者称作帝党，后者称作太子党。这两党之间彼此争斗，愈演愈烈，矛盾不断升级激化。为了得到政治上的有利地位，两党开始诉诸于军阀势力，谋求获得军事力量的有力支持。其中，帝党与孛罗帖木儿联手相助，太子党则以扩廓帖木儿作为外援。在元廷内部发生争夺皇权的激烈内讧中，山西地区转变成元顺帝党羽的藏匿之所与皇太子出逃避难及其兴师谋复的回旋之地。

至正二十三年（1363），老的沙在宫中以“执其事颇力”[20]，且与秃坚帖木儿冒犯皇太子。因此，皇太子欲诛二人。元顺帝在二人逃往大同之后，专门派出宦官密谕孛罗帖木儿，命令将其匿留军中。皇太子穷究不舍，屡次索取，孛罗帖木儿却遵奉谕旨匿而不遣，从而与皇太子反目结怨。

至正二十四年（1364）三月，元廷声称孛罗帖木儿悖逆作恶，暗杀其叔父左丞相只儿不花，藏匿老的沙，诏罢孛罗帖木儿兵权，削其官爵，且候道路开通，送往四川进行安置。这个事件其实是太子党为了打击孛罗帖木儿，迫使元顺帝退让妥协的重大步骤，所谓“诏令调遣之事非出帝意，皆右丞相搠思监所为”。[11]不料，孛罗帖木儿杀使拒命，派遣部将会同秃坚帖木儿“以兵向阙，声言清君侧之恶”[1]，攻入居庸关。秃坚帖木儿进入大都以后，觐见元顺帝于延春阁。元顺帝设宴慰勉，诏赦其罪，进而惩治搠思监与朴不花，特意加封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平章，兼知枢密院事，依前守御大同，同封秃坚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在孛罗帖木儿还军大同之后，皇太子返回皇宫，“震怒不已”[1]，再次迫使元顺帝下诏征调扩廓帖木儿军马讨伐孛罗帖木儿。

五月，元廷诏命扩廓帖木儿总兵调遣诸道之军分讨孛罗帖木儿。借此，扩廓帖木儿衔恨大发诸道军兵夹攻大同，东道以白锁住派兵一万，守御京师[11]，中道以貂高、竹贞领兵四万，西道以关保领军五万，合击孛罗帖木儿。同时，扩廓帖木儿又遣河南省右丞魏赛因不花统兵从“汾隰北上经临、石，跋兴、岚、定襄、隩”，攻克武州。[1]扩廓帖木儿亲自将兵太原，督调诸军。七月，当关保等军逼近大同之际，孛罗帖木儿一面分军守卫大同，一面亲率兵马与秃坚帖木儿、老的沙再次举兵向阙[21]，遂使“京师震惊”。于是，皇太子“亲自统兵迎战于清河”[13]，并派中书左丞相也速、詹事不兰奚率军驻扎昌平。交战之后，也速军失斗志，不战而溃，不兰奚军战败而去，白锁住部将杨同金则被攻杀于居庸关，遂使孛罗帖木儿的前锋进入京郊。当时，皇太子被迫驰还都城，以白锁住为扈从，出顺承门，由雄（今河北省雄县）、霸、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取道出奔太原避难。

孛罗帖木儿一入大都，便与秃坚帖木儿、老的沙三人在宣文阁再謁元顺帝，泣拜诉冤，元顺帝“亦为之泣”，再次赐宴进行款待，诏命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左丞相，老的沙为中书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且以“部属将士，布列台省，总揽国柄”。[22]八月，元廷加封孛罗帖木儿为中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节制天下军马。

皇太子逃往太原以后，便以山西地区作为根据地，呼应四方，“日夜谋除内难” [23]，以图恢复之计。至正二十五年（1365）三月，皇太子在太原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始于扩廓帖木儿军中发出号召，声称“孛罗帖木儿袭据京师，余既受命总督天下诸军，恭行显罚，少保、中书平章政事扩廓帖木儿，躬勒将士，分道进兵，诸王、驸马及陕西平章政事李思齐等，各统军马，尚其奋义戮力，克期恢复”。同时，又命魏赛因不花移镇武州要塞偏头关，以照应大同，西击东胜，招徕云、朔、丰、静之人。[21]

由于得到山西地区的强大支持，夏四月，关保等军迅速围攻、占领大同。其间，孛罗帖木儿派出秃坚帖木儿率军征讨上都的太子党成员，并且调动也速南御扩廓帖木儿所部竹贞、貂高等军。不料，也速遣人西连太原扩廓帖木儿，东连辽阳也先不花，军势大振。孛罗帖木儿随即派遣骁将姚伯颜不花统兵征讨，但却遭到也速出其不意的袭杀而阵亡军中。于是，孛罗帖木儿亲自将兵出军，又在通州遇雨不进而还。随后，孛罗帖木儿在失去退路的绝望情形下，疑杀所部骁将保安，且无奈大势已去，每日与老的沙饮宴作乐，“酗酒杀人，喜怒不测，人皆畏忌”。[13]为此，元顺帝不得不发密旨，命令威顺王子和尚与徐士本密谋起事，召集勇士上都马等人着手行刺已经丧失政治作用的孛罗帖木儿。

秋七月，孛罗帖木儿以罪伏诛。接着，秃坚帖木儿、老的沙相继遁逃，帝党土崩瓦解。随后，元顺帝遣使函赏孛罗帖木儿首级前往冀宁，拱手让权，且命皇太子分调将帅，率军戡定未复郡邑，即还京师，甚至可在“行事之际，承制用人，并准正授”。九月，扩廓帖木儿扈从皇太子返回京师。冬十月，元廷“诏封扩廓帖木儿河南王，代皇太子亲征，总制关陕、晋冀、山东等处并迤南一应军马，诸王各爱马应该总兵、统兵、领兵等官，凡军民一切机务、钱粮、名爵、黜陟、予夺，悉听便宜行事”。[13]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二月，扩廓帖木儿抵达河南，“分省以自随”，有权调度各处军马，“官属之盛，几与朝廷等”。[1]至此，扩廓帖木儿依靠河东山西辅佐皇太子夺回权势之功，“畀以相位，陟以师垣，崇以王爵，授以兵柄”，成为有元一代最后一个势重位高的地方军阀。

四、中央政权与地方军阀的相互争斗

元末之中，中央政权与地方军阀之间也发生了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山西地区不仅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军阀相互混战的主要战场，而且还成为地方军阀扩廓帖木儿拥兵自重的割据之地。

至正二十七年（1367）夏八月，元顺帝在朝廷内外尖锐矛盾暂时缓和的形势下，诏将“元良重任，职在抚军”的大权交给皇太子，命其“以中书令、枢密使，悉总天下兵马，诸王、驸马、各道总兵、将吏，一应军机政务，生杀予夺，事无轻重，如出朕裁”，且命扩廓帖木儿“总戎重寄，畀以王爵” [19]，总领本部军马，代皇太子南征明军，同时还对李思齐、秃鲁、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等各枝军马分别委派职权与使命。然而，这份诏书的墨迹未干，元廷与扩廓帖木儿之间又爆发了新的争斗。这场争斗是元末上层统治集团的最后一次内乱，全部过程较为复杂，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长期构兵不休，久违元顺帝的意旨，特别是扩廓帖木儿极力支持皇太子，迫使元顺帝最终不得不交出军政大权，因而一直为元顺帝所忌恨。

第二、皇太子出奔太原以后，“欲用唐肃宗灵武故事自立，扩廓帖木儿与孛兰奚等不从”。在皇太子还京师时，皇后奇氏“令扩廓帖木儿以重兵拥太子入城，欲胁帝禅之位”，扩廓帖木儿却违逆懿旨，在离京城三十里处遣散其军。“由是皇太子心衔之”。[1]

第三、扩廓帖木儿“构兵关陕，专事吞并”，元顺帝诏命其南征明军以后，他“终扞拒不肯受”，因以保存实力而将“天子之命置而不问，朝廷因疑其有异志。” [19]

第四、扩廓帖木儿被封为河南王之后，“朝士往往轻之，谓其非根脚官人”。[6]特别是扩廓帖木儿不善抚字御众，“诸将积不相能”，“共谗王保保欲叛”[24]，甚至连“尤为察罕帖木儿所信任”的貂高与“自察罕帖木儿起兵以来即为将”的关保都背叛而去。[1]

这场内争的实质并不像《元史·顺帝本纪》中所说那样，仅仅在于扩廓帖木儿“不遵君命”，而是源于其违背了元廷内外方方面面的诸种意愿，所以“宜黜其兵权”。然而，这场内争的导火索却燃自于貂高的上疏言事。貂高在上疏中提到：“人臣以尊君为本，以尽忠为心，以爱民为务。今总兵官扩廓帖木儿，岁与官军仇杀，臣等乃朝廷培养之人，素知忠义，焉能俯首听命。乞降明诏，别选重臣，以总大兵”。[19]为此，元廷以貂高能倡大义，“首发奸谋”，赐号忠义功臣。

至正二十七年（1367）夏八月，元廷以貂高首列扩廓帖木儿罪状闻于朝中，且“善论兵”，诏命貂高举兵讨伐扩廓帖木儿。同时，设立大抚军院，由皇太子“专掌军机”，总制天下军马，“专备扩廓帖木儿”。[1]随后，元廷又派朝中重臣，分省山西地区，着手取代扩廓帖木儿的政治势力。九月，元廷诏命中书左丞相、知枢密院沙蓝答里分省大同，以哈剌那海为大同分省平章，阿剌不花为参知政事。又置分省于冀宁，升冀宁总管为参政，“铸印与之，凡事必咨大同分省而后行之”，加强元廷在山西地区的统治力量。[10]接着，元廷诏命将扩廓帖木儿所统诸军，分由白锁住、虎林赤、李克彝、也速、沙蓝答儿、貂高等统领，且指令将扩廓帖木儿在山西地区的军队由沙蓝答儿节制统领。同时，元廷诏罢扩廓帖木儿太傅、中书左丞相并诸兼领职事，保留前河南王一职，赐以汝州为其食邑，命其还居河南旧地，从行官属悉令还朝。扩廓帖木儿在获悉事变之后，退军屯住泽州地区，继续留在山西地区割据自保。冬十月，貂高以兵平定孟州（应为孟州）、忻州，下潞州，遂攻真定。是月，平章、内史关保也因“弗信邪言，乃心王室，陈其罪恶，请正邦典”[19]，与貂高一起反叛扩廓帖木儿，而被元廷授封为许国公。十一月，元廷诏命关保分省于晋宁。

至正二十八年（1368）春正月，元廷命左丞孙景益分省太原。扩廓帖木儿则据守太原，釜底抽薪，尽杀元廷所置命官。其间，元廷一度发动政治攻势，诏谕扩廓帖木儿悔过自新，以其如能“思昔委任肃清江淮之意，即将冀宁、真定诸军，就行统制渡河，直捣徐沂，以康靖齐鲁，则职任之隆，当悉还汝”。同时，元廷还准备在攻势无效的情况下，采取剿灭扩廓帖木儿的军事措施。为此，皇太子命关保固守晋宁，总统诸军，“如扩廓帖木儿拒命，当以大义相裁，就便擒击”。[19]但是，扩廓帖木儿为了保存在河东山西的军政实力，执意不从元廷诏谕。二月，元廷下诏削夺扩廓帖木儿的爵衔封邑，发其罪状，以军声讨。随后，诏命秃鲁与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与魏赛因不花及关保诸军出兵夹攻，共行征剿，“以正天讨”。[25]

为了避免元廷的军事打击，扩廓帖木儿自泽州退军戍守平阳，相机反击。关保进据泽、潞二州以后，始与貂高军合军追剿。此外，元廷又命知枢密院事脱火赤、平章政事魏赛因不花进兵晋宁，力图一举消灭扩廓帖木儿。是年之秋，貂高、关保兵攻平阳。扩廓帖木儿故意显出士气稍沮，以计诱敌。关保“勇冠诸军”，貂高则“善论兵”，均以多年转战山西地区，“势甚振，数请战，扩廓帖木儿不应，或师出即复退”[25]，遂使貂高轻战而分军抄掠祁县。结果，扩廓帖木儿夜出袭杀，大败其军，乃使貂高、关保双双就擒被俘。

元末中央与地方军阀之间所发生的这场尖锐的矛盾冲突最终是以明军北伐的到来与元朝丧钟的敲响而宣告结束的。在貂高、关保军败被俘之后，元廷已经无力继续征剿扩廓帖木儿。此时，明军已定山东及河、洛，中原非复向日，俱已不守。于是，元顺帝一面诏告扩廓帖木儿“关保、貂高，间谍构兵，可以军法处治”，一面诏罢大抚军院。扩廓帖木儿则在“势已穷蹙”，“党与离散”的状况下，“屡上书疏，明其心曲”[25]，“自陈其情悃，帝寻亦悔悟，下诏涤其前非”。[19]双方妥协以后，元顺帝下诏复命扩廓帖木儿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的爵衔，命其与太保、中书右丞相也速、少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等所统各部对付明军，收复失地。然而，也速军临战兵溃，秃鲁、李思齐未能出兵，扩廓帖木儿保存实力依旧不战，且将军队从平阳退到太原，无复南向。此时，明军迫近大都，局势已不可为，元顺帝唯有亡国北奔，别无选择。

五、明军北伐与元军顽抗

元末之中，山西地区不仅在元末上层统治集团的激烈争夺中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明军北上占领大都以后继续产生着特殊作用，而被扩廓帖木儿作为元朝统治中原汉地的最后堡垒与明初南下的用兵要冲。

在明军北上占领大都以后，山西地区仍是扩廓帖木儿进攻大都的最后据点。至正二十六年（1366）冬十月，正当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张良弼等地方军阀构怨不休，屡相攻击之时，朱元璋召集诸将商议北伐，确定出一套完整的战略方针，即“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26]这一战略方针的最终确定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山西地区，但却从客观上反映出朱元璋以“三晋表里河山”，属于天下四要之地^[27]，因而采取兵家历来惯用的避实就虚作战原则，先入河北，攻占大都，最后解决山西地区这个最后堡垒的战略思想。

至正二十四年（1364），徐达受命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至正二十八年（1368）八月，元顺帝带领后妃太子逃往北方，徐达占领大都。朱元璋获得捷报之后，诏以大都为北平府，留孙兴祖等驻军守备，且命徐达与常遇春进取河东山西。^[28]随后，朱元璋“命冯宗异由河南征山西地区，以兵会达”。^[29]常遇春先下保定、中山、真定；冯宗异、汤和、下怀庆（今河南省沁阳），越过太行山，克碗子城，攻取泽、潞^[30]；徐达则率大军殿后而进。

十一月，徐达派遣傅友德、薛显率领三千骑略平定州，擒元将汤同佖，遂率师度井径故关，命令右丞薛显取乱柳寨^[31]，又遣参政陆聚守井陘关。^[31]当时，扩廓帖木儿驻扎太原，尚有“军数十万”。^[32]为了站稳脚跟，继续对抗明军，扩廓帖木儿一面派出韩札儿前攻泽州，一面亲自引兵出雁门关，企图从居庸关进攻北平。当时，徐达派遣杨璟往援泽州，大战韩店，作战失利而还。

十二月，徐达经与诸将商议，采取“扩廓远出，太原必虚”，“乘敌不备，直捣太原，使进不得战，退无所守”的战略战术。^[32]在诸将达成共识以后，徐达便引兵自真定出井径，直捣太原。扩廓帖木儿闻讯以后，回援老巢，“其锋甚锐”。傅友德前往迎战，扩廓帖木儿“以万骑突至”。^[33]常遇春建议：“我骑兵虽集，步卒未至，骤与战必多杀伤，夜劫之可得志”。^[28]徐达采纳常遇春的明智建议，以约降的扩廓帖木儿部将豁鼻马作为内应，选派精骑衔枚夜袭。扩廓帖木儿仓卒应敌，仅以十八骑逃往大同。战后，徐达尽降其众，得甲士四万余人，“马四万余匹”，遂克太原。常遇春追击扩廓帖木儿至忻州而还。其间，“崞、忻、霍、绛、猗氏等处皆定”。^[34]同时，明军又破扩廓帖木儿所部于泽、潞。^[35]于是，徐达乘势北收大同，分兵往徇河东未下州县。

洪武二年（1369）春，常遇春自太原攻下大同，基本平定了整个河东山西，将元朝的残余势力驱往漠北。由此，“晋冀之地悉入版图，天下之乱，十平其九”。^[36]但是，逃往北方的元朝残余军事势力并不甘心于失败，多次向山西地区发动反攻，试图重新打开通往中原的道路。因此，山西地区在明军北定大都与巩固北部边防之时，又成为元朝残余军事力量用兵南下的要冲之地，因而受到明朝上下的特别重视。当时，山西地区已经不是燕都内屏，而是外患威胁之地。八月，脱列伯、孔兴以重兵展开对大同的进攻，被李文忠出兵雁门关击败。李文忠除了生擒脱列伯以外，还“降其众万余”^[29]，给予元朝残余军事势力以沉重打击。

洪武四年（1371），元兵攻武、朔二州，被徐达遣陈德、郭子兴击破。不久，元兵又先后进犯白登、保德、河曲，但却均为守将击败。为了防止元兵的不断进攻，徐达在山西地区进行练兵，积极备战。

洪武五年（1372）春，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征西将军冯胜率师三路征讨北元。大将军徐达率领中路军出兵雁门，出师不利，而不得不退回山西地区驻军守塞。

洪武六年（1373）夏四月，扩廓帖木儿再次遣兵进攻雁门，被明军指挥吴均击退。同时，元兵又攻武州、朔州，后因徐达遣军到达，乘夜逃去。秋八月，元兵再攻朔州，被明指挥谢彦大破其军。冬十一月，扩廓帖木儿又攻大同，被徐达遣领再次击败。当时，朱元璋一直命令徐达与李文忠留镇山西地区守备边地^[37]，这些活动充分表明河东山西在保卫北部边地之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对于山西地区的重要

要地位及其作用，明人高岱一针见血地说过：“河东既平，然后燕京、大梁可得而安”。[29]明军平定北边前前后后的所有一切再次证实了这一论点。[38]

元末之中，北方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建立宋政权以后，以韩林儿、刘福通为首的北方红巾军为了更为有力地打击元朝统治集团，发动了攻势强大的北伐战争。在这次北伐战争中，山西地区成为红巾军实现夹击大都战略目标的重要战区。然而，由于河东山西地方军阀的势力强大，不仅充分利用了山西地区的险要地形，而且还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致使红巾军不断遭到严重打击，最后以受挫失利告终。

在镇压北方红巾军的过程之中，山西地区逐步形成两大地方军阀集团，一是以察罕帖木儿为首的军阀集团，一是以孛罗帖木儿为首的军阀集团。这两大地方军阀集团是在红巾军分成三路北伐期间勤王进入河东山西的。随着红巾军在山西地区的作战失利，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个人野心逐渐膨胀，始将山西地区变成相互争夺的主要地区与重要战场。

除了地方军阀在外争夺以外，元廷内部逐渐形成支持元顺帝的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一党与支持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奇皇后、丞相搠思监、宦者朴不花一党。两党之间彼此争斗，愈演愈烈，矛盾不断升级激化。为了得到政治上的有利地位，两党开始诉诸于军阀势力，谋求获得军事力量的有力支持。其中，帝党与孛罗帖木儿联手相助，太子党则以扩廓帖木儿作为外援。在元廷内部发生争夺皇权的激烈内讧中，山西地区转而变成元顺帝党羽的藏匿之所与皇太子出逃避难及其兴师谋复的回旋之地。

元朝行将灭亡之际，中央政权与地方军阀之间也发生了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山西地区不仅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军阀相互混战的主要战场，而且还成为地方军阀扩廓帖木儿拥兵自重的割据之地。其后，山西地区被扩廓帖木儿作为元朝统治中原汉地的最后堡垒与明初南下的用兵要冲。

有元一代，山西地区在错综复杂的军事争夺之中具有不同寻常的特殊作用。元朝末年，山西地区不仅在元末上层统治集团的激烈争夺中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明军北上占领大都以后继续产生着特殊作用。综上所述，山西地区对于藩辅拱卫京师大都，维护腹里地区的政治稳定与延缓元统治者对全国各地的持续统治都有相当重要的内在影响。

参考文献

- [1]（明）宋濂等撰.元史[M].卷一百四十一，《察罕帖木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 [2]乾隆潞安府志[M].卷三〇，见杨讷，陈高华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清）陈泽霖鉴定，杨笃纂修.长治县志[M].光绪二十年刊本，卷五，《集传》.
- [4]顺治潞安府志[M].卷一五，《纪事》，见杨讷，陈高华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5]（清）马丕瑶，魏象乾裁定，张承熊纂修.解州全志[M].光绪七年刊本，卷十二，《颍川忠襄王庙碑记》.
- [6]庚申外史笺证[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1991.
- [7]（明）宋濂等撰.元史[M].卷二百一，《列女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
- [8]（清）张廷玉等撰.明史[M].卷一百二十二，《韩林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 [9]（明）宋濂等撰.元史[M].卷二百七，《逆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0]（明）宋濂等撰.元史[M].卷九十二，《百官八》；卷四十五，《顺帝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1]（明）宋濂等撰.元史[M].卷四十五，《顺帝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2] 永乐大典[M]. 卷五千二百三, 《太原府五》.
- [13] (明)宋濂等撰. 元史[M]. 卷四十六, 《顺帝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4] 山右石刻丛编[M]. 卷四十, 《龙王感应记》.
- [15] 山右石刻丛编[M]. 卷四十, 《官水磨记》.
- [16] 山右石刻丛编[M]. 卷四十, 《忽都帖木儿祷雨获应记》.
- [17] 山右石刻丛编[M]. 卷四十, 《祷雨获应记》.
- [18] (明)宋濂等撰. 元史[M]. 卷二百五, 《搠思监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9] (明)宋濂等撰. 元史[M]. 卷四十七, 《顺帝十》.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0] (明)宋濂等撰. 元史[M]. 卷二百四, 《朴不花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1] (明)李侃, 胡谧纂修. 山西通志[M]. 卷十五, 《知院魏公去思之碑》.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22] (明)宋濂等撰. 元史[M]. 卷一百四十二, 《也速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3] (明)宋濂等撰. 元史[M]. 卷二百七, 《逆臣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4] 草木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5] (明)宋濂等撰. 元史[M]. 卷一百八十六, 《陈祖仁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6] (清)张廷玉等撰. 明史[M]. 卷一, 《太祖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7] 明太祖实录[M]. 卷二十.
- [28] (清)张廷玉等撰. 明史[M]. 卷一百二十五, 《常遇春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9] 高岱. 鸿猷录[M]. 卷五.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30] (清)张廷玉等撰. 明史[M]. 卷一百二十九, 《冯胜传》; 卷一百二十六, 《汤和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1] 井陘县志[M]. 雍正八年修,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 [32] (清)张廷玉等撰. 明史[M]. 卷一百二十五, 《徐达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3] (清)张廷玉等撰. 明史[M]. 卷一百二十九, 《傅友德传》; 高岱: 《鸿猷录》卷五.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4] (清)张廷玉等撰. 明史[M]. 卷一百三十一; 高岱: 《鸿猷录》卷五.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5] 明实录[M]. 卷三十五; 《庚申外史笺证》. 第 149-150 页.
- [36] 明太祖实录[M]. 卷三十七.
- [37] (明)严从简. 殊域周咨录[M]. 卷十六.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38] (清)张廷玉等撰. 明史[M]. 太祖本纪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Military Conflicts in Shanxi Region during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Qu Dafeng

(Institute of Mongol Histor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Inner Mongolia,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situation of whole country was turbulent and various social conflicts flared up. When large-scale peasant wars burst out one by one both north and south, the upper ruling strata of the Yuan Dynasty took place an intricate series of contentions with each other. In thi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Shanxi Region was involved in the internal conflicts of the court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var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forces so that it exerted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Fu-li Region even the whole nation in militar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This paper plans to discuss the related issues about the red-scarves force, local warlords, internal conflicts of the court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of the Ming Force in the Shanxi Region.

Key words: Yuan Dynasty;Shanxi Region, Military struggle

收稿日期: 2011-03-15;

作者简介: 瞿大风 (1954-), 男, 汉族, 浙江杭州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南开大学历史博士, 主要从事元史研究。